

战后国际关系史

(1945—1995)

(上)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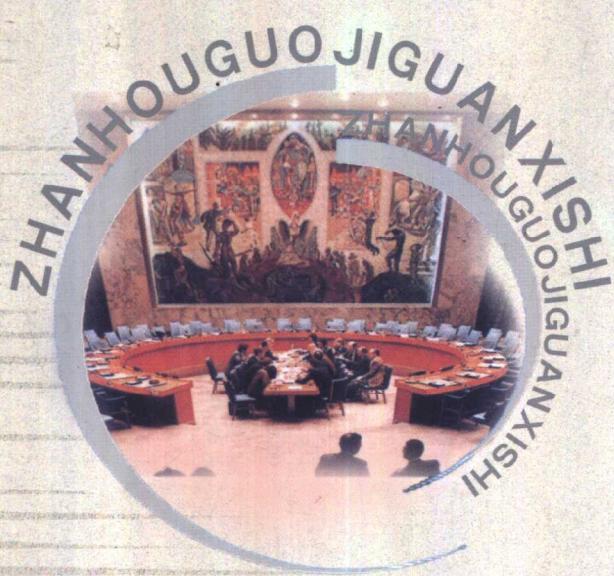


战后国际关系史

(1945—1995)

(下)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战后国际关系史

ZHANHOU GUOJU JIGUANXISHI

(1945-1995)

责任编辑 金娟萍 封面设计 张 虹

ISBN 7-301-04049-0



9 787301 040492 >

ISBN 7-301-04049-0/D·416

定价：50.00元（上、下）

战后国际关系史

(1945—1995)

(上)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主编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北 京

战后国际关系史

(1945—1995)

(下)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方连庆等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

ISBN 7-301-04049-0

I. 战 II. 方… III. 国际关系史-1945—1995 IV. T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528 号

书 名: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

著作责任者: 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 主编

责任编辑: 吉宛 金娟萍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049-0/D · 41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7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38.625 印张 96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上、下)

编著者说明

本书既是一部学习和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的教材，也是一部专著。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依稀可见之际，我们编写了《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分析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力求准确、科学地揭示这一时期风云变幻、扣人心弦的历史进程。本书在体例上主要按编年系统撰写，共分6编23章，既反映战后国际关系史的连续性，也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书中依据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始文件，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陆续公布的解密档案材料，同时我们也利用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一些新材料，并参阅了大量中外书刊。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在书后附录了1945—1995年苏联、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历届政府更迭表、大事年表、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和外国地名译名对照表。

本书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参加撰稿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方连庆：编著者说明、序言、对德日前盟国的处理和五国和约的缔结、全书的美国部分；王炳元：全书的中国部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外国地名译名对照表；朱文莉：全书第十三章以后的第三世界部分、第二十章以后的日本和中日关系部分、联合国作用的加强、美英历届政府主要成员名单、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历届政府主要成员名单；刘金质：全书的苏联、俄罗斯、苏美关系、苏中关系的分歧和恶化、俄美关系及东欧部分，

苏联、俄罗斯历届政府主要成员名单；刘魁朝：全书第二十章以前的日本和中日关系部分、日本历届政府主要成员名单；吴方桂：第七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及第十二章以后的西欧部分、法国临时政府时期和第四共和国时期历届政府主要成员名单；李茂春：全书第十三章以前的第三世界部分；潘琪昌：第一章第二节、第七章第一节及第十一章第三节的西欧部分、德国历届政府主要成员名单。杨淮生：大事年表。全书最后由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统一修改定稿。

本书蒙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和支持，并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热诚帮助，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尽管我们为编写本书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和对战后国际关系特别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不够，书中疏漏和缺点所在多有，望方家和读者斧正。

编著者

1997年8月于北京大学

序　　言

战后国际关系史或曰当代国际关系，从严格的世界史的角度来说，它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是现代国际关系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赓续和发展。

本书所涵盖的时期是从1945年9月到1995年9月，即战后国际关系50年。这50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

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的对峙为特征。但由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化以及苏美两国实力的不断消长变化，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逶迤曲折，在不同阶段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1945—1949年。上限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下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标。这一阶段是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确立的时期。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结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两国的矛盾日益突出。美国凭借其战时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严重障碍。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先后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并策划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动了对苏联的全面“冷战”。面对美国的遏制、封锁和包围，苏联则通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与“经互会”，加强了同东欧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合作。美苏战时同盟宣告解体，两国由盟友变成敌人。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

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由此开始。但两大阵营并没有涵盖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战后初期，东南亚和南亚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和一批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冲垮了亚洲殖民体系，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支新兴力量。

第二阶段：1950—1959年。始于朝鲜战争爆发，终于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这一阶段是两大阵营对抗和激烈斗争的时期，也是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实质是美苏对抗，对抗的主要表现在亚洲是朝鲜战争，在欧洲是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形成。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目的是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进而扼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由于中朝人民的英勇抗战，使美国遭到惨重失败。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两大阵营的一次“热战”，它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宣告结束。1955年5月，美国通过“巴黎协定”把西德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企图把它作为北约抗衡苏联的前哨阵地。同年5月14日，苏联同东欧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第二年东德加入了该组织。至此，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但在50年代中期以后，两大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已开始暴露。西欧国家对美国的控制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对抗措施。1958年1月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是典型事例。苏联外交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也时有表现，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匈事件突出反映了苏东矛盾的尖锐性。1959年秋，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鼓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表明苏联外交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这一阶段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并由此诞生了“万隆精神”。它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崭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这是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史上一个重要的里

碑。

第三阶段：1960—1969年。上限始于苏联撕毁同中国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和协议，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下限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珍宝岛为界标。这一阶段是国际政治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资本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主要标志是中苏同盟破裂。中苏分歧始于50年代中期，其主要根源是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苏联撕毁同中国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和协议，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1962年苏联竟在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并不断制造边界冲突，直至1969年公然出兵侵犯我国珍宝岛。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在东欧，1968年苏联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充分暴露了它霸权主义的真面目，表明苏联已演变成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阵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世界革命风暴的冲击，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方面，美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侵朝侵越战争中损失巨大，实力衰落；另一方面，西欧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美国，成为与美国并列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西欧实力增强之后，加强了同美国的竞争与反控制斗争。最突出的表现是法美矛盾的激化。法国戴高乐政府，在经济上积极主张加强欧洲经济共同体，与美国抗衡；在政治上反对美国控制欧洲，倡导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在军事上抵制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反对北约军事一体化，并于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限令撤走美国在法驻军及军事基地，把北约总部赶出巴黎；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主动调整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与中国建交。这表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日本在60年代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到6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法和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日

美经济贸易矛盾和摩擦也随之激化，最突出的是双方围绕日本纺织品输美问题展开的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显然，日本同西欧一样，也成了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重要竞争对手。

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以争夺为主。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战后美苏两国第一次大规模迎头相撞。结果是苏联以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告终，表明苏联的实力尚不能与美国匹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积极增强经济实力，并利用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潭之机，拼命扩充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核武器，逐步扭转了战略上的不利形势，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民族解放运动在60年代出现了新的高潮，其特点是革命风暴的中心从亚洲转到了非洲。仅1960年一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到6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国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的推动下，也掀起了反美风暴。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应运而生，成为第三世界崛起的鲜明标志。

第四阶段：1970—1979年。始于《苏联—西德条约》签订，终于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一阶段是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联合反霸的时期。70年代美苏争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缓和”的烟幕下进行；二是战略态势苏攻美守。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演变，苏联不仅在常规军备方面继续保持对美的优势，而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也赶上美国。尼克松为保持美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同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即“尼克松主义”），不仅阐明了美国对亚洲政策新的指导方针，而且也是调整全球战略的信号。美国决心“收缩力量”，减轻“全球义务”的负担，以“实力”为后盾，同对手进行“对话”或“谈判”，以便在美苏和其他大国之间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均势。“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

对外政策进入了一个以收缩海外力量和“缓和”同苏联关系为特点的新时期。

苏联为巩固和发展对自己有利的战略形势，也企图在“缓和”的掩护下，分化、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1970年8月，苏联与西德签订了《苏联—西德条约》，苏以在西柏林问题上的让步换取西德承认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从而揭开了“缓和”的序幕。1975年召开的“欧安会”和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战后欧洲分治的现状。在欧洲缓和局面得到稳定的情况下，70年代后半期苏联便放手对外发动新攻势，在亚洲和非洲扩张势力范围。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胁了美国在中东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从而宣告了“缓和”的破产。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和争夺。

第三世界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1971年10月，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由于广大中小国家的团结斗争，以76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议案，显示了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巨大力量。1973年，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团结协作，展开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石油斗争，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打击。1974年4月举行的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强烈愿望。在这个时期，由拉美国家发起的维护海洋权益，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运动，迅速得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和响应，沉重地打击了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到7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在联合国占有2/3以上的多数，改变了超级大国任意摆布联合国的局面。联合国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舞台。

第五阶段：1980—1989年。始于“卡特主义”出笼，终于东欧剧变。这一阶段是美苏关系既对抗又对话和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苏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1980年1月，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都将遭到美国“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项有关波斯湾的新政策，后被称为“卡特主义”。它标志着美国的对苏政策由缓和转向强硬。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上台后，在“重振国威”的旗号下，调整了对苏战略，加强对苏的遏制和对抗，力图扭转美国在70年代同苏联争夺的不利局面，恢复和扩大美国在全世界的势力和影响。为此，美国大肆扩充军备，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目的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空间技术优势，同苏联在太空领域展开新一轮竞赛，以打破双方的核均势，夺取对苏的核战略优势，并在军备竞赛中拖垮已陷入困难的苏联经济。在外交上，美国由守转攻，公开宣称不承认欧洲被分割的现状合法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苏联在亚、非、拉的扩张和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更加咄咄逼人，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促进东欧和苏联向“更加开放”和“人道的社会”演变。

苏联长期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进入8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军费开支增长速度放慢，扩张势头减弱。但是，苏联决不允许美国取得对苏的军事优势。面对美国的挑战，它决定加速研制和部署新一代核武器，特别是太空武器。在外交方面也采取针锋相对的不妥协态度。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尖锐的对抗。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经济困难加剧，国内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尖锐，苏联同美争霸已力不从心，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战略收缩，缓和对美的僵硬态度。1987年12月，美苏签订中导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出现了双方既对抗又对话的局面。苏联试图利用缓和的国际形势，实现加速发展战略，保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

但是,与美力量对比的颓势难以扭转,争霸的态势已由 70 年代的苏攻美守转为美攻苏守。

西欧和日本在 80 年代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随之发展。欧洲共同体在接纳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之后,成员国由 9 国扩大至 12 国,整体实力大增。1989 年欧洲共同体国内生产总值达 5.6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其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40%,居世界之冠。随着实力和自主意识的增强,西欧在对美经济关系中,竭力反对美国的控制和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并在金融、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同美展开了激烈竞争。在外交上,西欧各国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在欧美同盟内部要求扩大自身权益和自主地位,并争取在美苏之间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回旋余地,以便使自己成为世界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日本同美国的经济竞争和贸易摩擦也日趋激烈。1989 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600 多亿美元,在美直接投资高达 800 亿美元。随着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高,日本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同美国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并努力发挥全球性作用。

东欧各国同苏联之间长期存在着争取独立自主与强化控制的激烈斗争。进入 80 年代,苏联自身的经济困难不断加剧,对盟国的控制能力日益减弱。东欧国家多年来因受僵硬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妨碍了经济发展。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通货膨胀,物价失控,群众不满,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机发动“和平”攻势,对东欧进行渗透、插手和干预,促使东欧政局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苏联的“新思维”和政策误导,加剧了东欧局势的不稳。1989 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震惊世界的社会剧变。之后,这些国家纷纷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方国家靠拢。

80 年代,在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巨大困难。发达国家特别是美

国,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困难,顽固坚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南方发展中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协调同北方发达国家对话中的立场,把重点转向加强集体自力更生,实现南南合作方面。1982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首次“南南会议”(又称“新德里磋商”)。1986年5月,在吉隆坡召开了第二次“南南会议”。1987年6月,在朝鲜平壤举行了南南合作部长级特别会议。这些会议讨论了加强和促进南南合作的战略设想,阐明了合作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协调了立场和行动,对于减少和摆脱对北方国家的依赖和控制,起到明显的作用。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增强。1989年9月召开的第9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继续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旨和原则,决定把争取和平与发展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这时,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已发展到102个,约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2/3,显示了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增长。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在80年代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1991年7月,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同年12月,苏联解体。这标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和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结束,雅尔塔体系宣告瓦解。从此,延续了40多年的美苏“冷战时期”的历史落下帷幕,战后国际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冷战后时期。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深刻变化,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点。

一是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一亡一衰”,美国虽然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整体实力相对衰

落，欧(特别是德国)、日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同欧、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已从冷战时期的政治上控制与反控制，经济上的贸易和科技竞争，发展到对欧洲、亚太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之争夺。俄罗斯作为原苏联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地位的继承者，是世界上惟一在军事上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虽然国内困难重重，但在国际事务中仍拥有重要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以居于世界前列的速度持续发展，外交方面取得巨大成效，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经济以高于发达国家一倍多的速度增长，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多极化趋势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二是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下降，经济因素上升。经济实力已成为决定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和作用的主要因素。各国普遍把经济作为外交工作的优先和重点任务。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中，经济和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的进程在加速发展。欧洲联盟进一步扩展，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亚太经济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世界贸易组织宣告成立。这一切必将对整个国际关系和未来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相互依存和合作的发展趋势加快。随着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利益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纵横交叉局面。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毒品贩运、恐怖活动猖獗等一系列全球问题，需要国家间加强合作，共同解决。虽然各国间仍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由于相互制约因素和共同利益增多，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已成为冷战后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主要形式和手段，这必将进一步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

四是世界总的趋势走向缓和。两极格局瓦解后，大国军事对抗